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 历史演进及实践经验^{*}

张桂文 王子凤

内容提要 本文阐述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考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领导核心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协调城乡关系、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四个方面总结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城乡融合

作者 张桂文，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子凤，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管理学院劳动关系学院助教。

一、引言

城乡关系涉及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群体、农业与非农业两类产业，以及城市

^{*} 本文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中国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1ZDA053）的阶段性成果。

与乡村两大地理空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其城乡关系的演变和重构过程。不论是发达国家完成二元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还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失败教训，都充分说明，处理好城乡关系不仅关系到城乡居民的福祉，也决定着现代化进程的成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①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转型发展，实现了从分离、对立到协调、融合的历史性转变。百年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持续性、系统性变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揭示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理论基础、历史逻辑，总结其实践经验，不仅对促进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价值。从现有研究文献看，国内外学者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了城乡关系的内涵、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中国城乡关系的现状与成因，以及协调城乡关系的对策建议，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已有研究文献主要采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并未细致地辨析该模型的隐含假设与中国本土化实践的匹配问题。^②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深刻认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应用与发展的学术成果还相对缺乏。本文在阐述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转型发展的实际，分析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进，总结中国促进城乡关系转变的实践经验，以期能够全面地把握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和最新成果。

二、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虽然马克思对城乡关系的阐述散见于诸多文稿，并没有形成以城乡关系为主题的显性理论体系，但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的阐述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理论体系中，具有内在的理论逻辑，遵循这一内在逻辑，可以梳理出其城乡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7页。

^② 高帆：《从割裂到融合：中国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8页。

（一）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城市与乡村的地位与作用

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乡村和城市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城市将成为经济与社会活动的中心。城市的中心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是现代工业的载体。现代大工业与城市直接相关，并以城市为空间依托。“它（大工业——引者注）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① 在马克思看来，曼彻斯特这一城市既是“英国工业的发源地”也是“英国工业中心”。^② 其二，城市通过其聚集作用，成为生产和需求的中心。马克思指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③ 其三，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打破了自然分工的地域限制。马克思指出，“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④

尽管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城市是经济与社会活动的中心，但马克思仍然十分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首先，“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⑤ 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次，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非农产业形成与发展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接生产者的食物生产占去；也就是使农业剩余劳动，从而农业剩余产品的成为可能。”^⑥ “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劳动者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⑦ 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决定着农业剩余产品的有无与多寡，进而决定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业内部的分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1-612页。

(二) 城乡关系的演变规律

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重点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把城乡关系纳入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演进的语境下，体现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历史视野。马克思把城乡关系的演变分为城乡浑然一体、城乡分离与对立、城乡融合三个阶段。^①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城乡关系的演变，认为城乡分离和对立是社会分工深化和私有制发展的产物。^②人类生存空间最初只有乡村聚落这一种形态，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城市才从乡村独立出来，进而产生了城乡的分离和对立。“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③在马克思看来，“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④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以及资本的集聚和集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不断扩大，城乡利益对立日益突出。

马克思认为城乡分离对立的历史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城乡分离和对立与单一的乡村聚落形态相比，具有历史进步性。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⑤“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⑥另一方面，城乡分离对立不仅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还造成了人的畸形发展。“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⑦

马克思认为城乡分离与对立是一个历史范畴，城乡分离与对立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不断深化，表明城乡分离对立必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消失。共产主义社会将“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⑧

① 陈轶：《城乡关系发展理论与实践——以石家庄为例》，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② 许彩玲：《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演进：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5年4月，第1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14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18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8-309页。

（三）实现城乡融合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路径

1. 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认为城乡关系理论演变的终极目标是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城乡对立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城乡融合创造相应的物质基础。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讲，“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①如果说城乡分离和对立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由私有制、异化劳动等造成的城乡分离和对立则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阶级对抗。^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③显然，马克思把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实现城乡融合的制度条件。

2. 加强工农生产的有机结合，协调城乡发展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基本路径

城乡融合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从生产力发展角度，马克思提出了实现城乡融合的基本路径。（1）加强工业与农业的有机结合。广义的工业与农业是以城市与乡村为空间载体的两大产业。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首先要加强农业与工业的有机联系。马克思明确提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渐消灭。”^④他认为工业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主张将工业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应打破城乡的地域界限，使农村劳动力实现“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⑤工业延伸至乡村，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2）实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马克思认为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城乡融合，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布局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⑦因此，为了使大工业生产摆脱地方性的局限，必须“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

② 周志山：《从分离与对立到统筹与融合——马克思的城乡观及其现实意义》，《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8-30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4页。

划地利用生产力”,^① 以使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② 此外,必须打破工农业生产之间的天然屏障,大工业也应该合理地分布在农村,发挥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3) 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分离对立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肯定了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仅表现为城市可以为农村提供机器设备、技术以及人才支持,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城市对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和影响上。^③ (4) 合理分布城乡人口。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下,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使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存。城乡之间的对立“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④ “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⑤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才能使农村人口从……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⑥ 这一观点既强调了城乡人口规模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也蕴含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思想。(5) 推动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城乡融合中的积极作用。他们指出:“这一(电的)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说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 strongest 有力的杠杆。”^⑦ 他们还认为,“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⑧ 推动农业发展,从而深刻影响城乡关系。

三、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刚刚完成,以机器大工业

-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3-684页。
③ 李天芳:《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协调路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0页。

为基础的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时代。^① 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基本上是根据西欧国家的历史，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形成的。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城乡关系问题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如何解决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乡关系矛盾，还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积极探索。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传统中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乡土社会，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源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和生活消费的需要。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另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又加剧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对立。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② 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已经形成，但其人数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5%；^③ 在外国资本的冲击下，农村自然经济虽然开始逐渐解体，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据优势地位，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因此，城市无法完全统制乡村，但乡村却基本上可以不依赖于城市经济而独立存在。^④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城乡关系，以及旧中国政治经济和阶级力量的对比，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把革命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是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型。

^① 周志山：《从分离与对立到统筹与融合——马克思的城乡观及其现实意义》，《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0页。

^③ 彭晓伟：《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0页。

^④ 宫玉松、聂济东：《科学认识中国近代城乡关系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3期。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认真思考如何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提出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兼顾城乡发展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阐述了农业的重要地位。毛泽东认为，农业关系到全国人民吃饭问题，并与其他日用品供给有很大关联；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销售市场；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①“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②关于处理城乡关系的原则，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就提出了兼顾城乡发展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党的城乡关系政策，先后围绕“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一化三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展开。^④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城乡兼顾思想的指导下，我党通过土地改革、调整税收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工商业发展，以及促进城乡商品交换和要素流动等措施，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巩固了新生政权。在此基础上，实施了“一五”计划，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基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实现“先进工业国”的战略目标，通过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持城镇的城乡关系政策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实现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重工业优先发展以及为实现这一发展战略所做的制度安排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但由于这一战略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时间过长，农业剩余不断地通过价格剪刀差等形式流入城市工业部门，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被严格限制在农业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③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圆满结束》，http://www.gov.cn/test/2008-06/02/content_1002469.htm。

④ 彭晓伟：《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32页。

部门，导致了农业积累能力不足和农村隐性失业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

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坚持把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的基本思想，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提出了工农并举、城乡兼顾的处理城乡关系的基本原则，丰富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形成了以“城乡互动”和“城乡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关系理论。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农业的作用，特别强调工业和农业、城市与乡村间的相互支持、相互促进。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时就指出，“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①“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②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情况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③“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要发展，离不开工业，而工业的稳步发展也不可能没有农业。农业不发展，工业就没有市场；工业不发展，农业也就不可能迅速发展。”^⑤“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⑥显然，邓小平同志认为工业和农业、城市与乡村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现代工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大力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以“城乡互动”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关系思想，是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2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19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6页。

的继承与发展，对于中国转型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政策的制定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把农业放到首位。江泽民同志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要“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①江泽民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依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是必要的，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就要“支持农业、武装农业”，要拿出一部分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农业。

虽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但受工业化初期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以及农业弱质性的影响，进入21世纪，我国城乡发展的二元反差更加突出。为了解决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城市和乡村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方略。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②根据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实际，胡锦涛进一步指出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③“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对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依据。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领导核心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环节，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习近平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

^①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0、144页。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1页。

^③ 陈燕妮：《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与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96页。

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①“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②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③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三农”工作的新进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④2019年5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进一步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⑤

综上所述，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互契合的演进轨迹。城乡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从分离、对立到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形成、深化到消解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既符合城乡关系演变规律又契合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实际的城乡关系发展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中国无法通过工业化启动二元经济转型进程，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7期。

^③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13年第22期。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围绕这一任务，基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城乡关系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依托农村根据地、依靠广大农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① 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通过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强化了农业、农村对工业和城市的支持，在建立了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的同时，也形成和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也影响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为了化解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共产党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城乡关系理论的认识，形成了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关系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制约我国二元经济转型最突出的短板。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主要矛盾转化的认识和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实现二元经济转型的需要，着力通过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形成工农互惠、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党对城乡关系的认识进一步升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体系不断完善。

四、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经验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不同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运用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分析和解决我国城乡关系面临的实际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这些新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分离、对立到协调、融合的历史性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讲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把握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富有成效的。”^①

回顾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如下基本经验。

（一）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作为处理城乡关系的基本原则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产生重要影响。正如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离不开价值观指导一样，在遵循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的前提下，党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国情制定的推进城乡关系演进的具体方略，也必然受到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价值理念的影响。

马克思在揭示城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城乡关系是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乡融合，“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②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无论不同历史时期城乡关系政策如何变化，这一基本原则始终不曾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③

诺斯在分析了国家和经济组织的新古典设想后，发现“新古典模式在其行为函数内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因为它既假定福利最大化又假定存在霍布斯主义的国家模式，而这将限制创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的行为”，“更一般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的整体与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因此能够抵御利益集团的压力和民粹主义的干扰，着眼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局处理城乡关系。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通过改革开放破除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

①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7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8-309页。

③ 汪晓东、张炜、宋静思：《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重要论述综述》，《人民日报》2021年11月6日。

④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9、51页。

型工农城乡关系”，^① 都是立足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也是根据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战略选择。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在当时特定的约束条件下，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实施这一战略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具有历史必然性。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点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通过从农业提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以及重工业的自身循环所创造的社会需求，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与有效需求不足两大难题，使我国经济在发展初期卓有成效地摆脱了低收入国家所共同面临的“贫穷的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增长陷阱”，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② 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维护了我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从经济改革角度检讨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得失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这一发展战略不能单纯从经济观点立论，必须全面考虑国际和国内政治因素，才能做出公允的评估。^③

（二）以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协调城乡关系

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分析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城市与乡村的地位与作用，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实现城乡融合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路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处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

中国共产党遵循城乡关系的演变规律，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制度创新，促进了中国城乡关系从分离、对立到协调、融合的演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①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党建》2020年第11期。

② 张桂文：《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考察与特征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

③ 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实施二元经济体制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这一发展战略实施的时间过长。姚洋和郑东雅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做了两个政策试验，一是中国实行平衡发展战略，二是中国实行适当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将其和实际结果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以1954年为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起点，发展战略的最佳转型时间约为1966年。而我国实际上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进行发展战略转型的，比最佳转型时间晚了13年。参见张桂文、周健等：《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64页。

会的主要矛盾，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本制度条件。^①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推进工业化进程，却也导致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从城乡关系演变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破除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通过以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乡城转移为主要内容的要素流动，不断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工业化和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实施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三大战略，初步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②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有效地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

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民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十分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依靠广大农民取得革命胜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以“城乡互动”和“城乡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从“以农补工、以乡助城”向“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政策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用大的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与深化阶段，中国共产党也未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兼顾城乡发展思想指导下，通过工业化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农业机械和人才支持，使我国城乡差距始终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了城乡差距过分悬殊。^③

（三）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基于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所涉及的研究国度，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不可能为解决中国城乡关系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综合考量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素禀赋，以及国内外发展环境，着眼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形成协调城乡关系的制度安排

^①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政权，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化三改”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③ 解安、覃志威：《中国共产党城乡关系探索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理论探讨》2021年第6期。

和政策导向，在促进城乡二元经济转型的同时，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力量对比，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不同于俄国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革命，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渐进制度变迁，突破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构想，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逐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主张。根据新发展阶段人民对农业、农村多功能价值的需求，以及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方面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根据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① 根据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突出短板，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路路线，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城乡关系协调发展，也推进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四）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要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协调好城乡关系，必须建立起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调节机制，在最大限度地激励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有效地克服涉农领域和城乡利益关系调节中的市场失灵，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与和谐。为此，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超历史的存在，而是存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现象”，^② 在现代化进程中协调城乡关系，必须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形成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不同组合。著名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② 张桂文、周健等：《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30页。

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在研究落后国家工业化时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即落后国家要赶上先进国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经济上多采取政府导向的大推进战略。罗荣渠教授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历史经验，把经济战略引申到政治战略，对格申克隆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一个国家工业愈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愈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①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有绝大部分比重，现代工业十分弱小，作为经济发展必要条件的社会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在上述条件下启动并完成现代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然是一个经济赶超过程。加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本身不健全，对于一些在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的过程和取得的成效，也就只能通过政府的行政干预来实现。当发展中国家现代工业体系基本形成、完成经济起飞后，通常会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更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虽然可以集中调配农业农村资源支持工业化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国民经济工业体系，但也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成为协调城乡关系、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经过经济发展初期的市场培育与完善，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各种要素市场也已基本形成，商品市场更加完善，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具有了现实可行性。

改革开放前，为了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我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民族工业体系。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排除了市场的作用，其固有的利益激励和信息传输方面的不足，难以有效地解决资源配置中的信息有效和激励相容两大难题。这一体制的长期实行，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也使传统的工业化战略无法继续施行。

1978年率先在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不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城乡居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和城乡要素的优化配置，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国民经济在多年高速增长之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城乡在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09页。

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政府治理，基本完成了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三大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明显增强。

总体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不同组合；另一方面根据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在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加强政府在涉农和民生领域的重要作用，着力克服涉农领域和城乡利益关系调节中的市场失灵，推进了城乡融合发展。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Zhang Guiwen Wang Zifeng

Abstract: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main contents of Marx's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t examines how leading cores of the Party have innovat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during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from four aspects: insisting on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concept, coordinating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dvancing the innov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times, and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Key words: Marx's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Sinic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uthors: Zhang Guiwen, professor and Ph. D.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Wang Zifeng, Ph. D. student of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and assistant teacher of School of Labor Relations, 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